

烽火家书映丹心

书信中的云南抗战故事之二



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本期3篇文章重读黄人钦、戴安澜、白雪娇三位爱国志士的家书，揭开一段段荡气回肠的抗战记忆。滇军连长黄人钦在新婚六日后奔赴战场，在台儿庄战役中壮烈殉国；远征军将领戴安澜在缅甸丛林中写下绝笔家书，以身殉国；南侨机

工白雪娇化名离家，在滇缅公路上以方向盘作刀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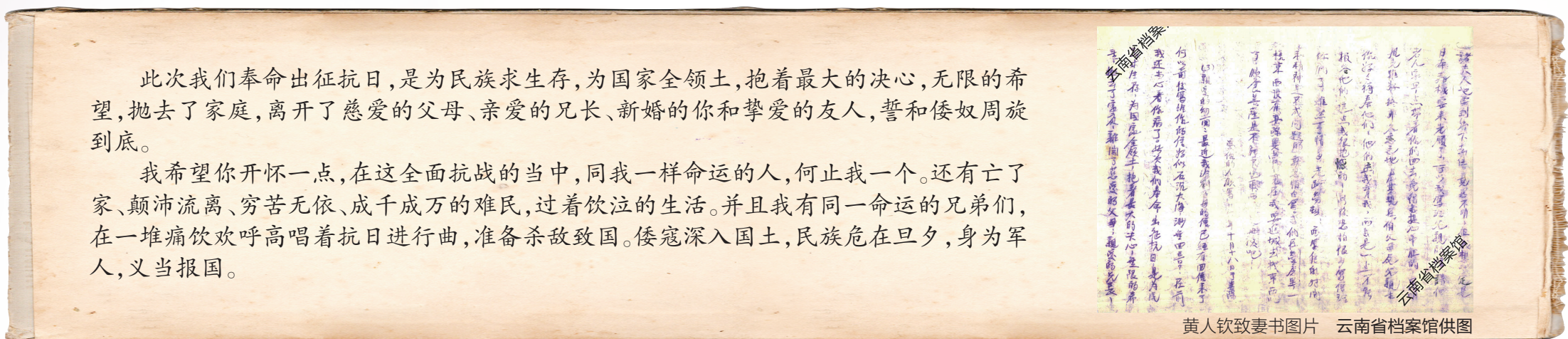
这些泛黄的家书，既是烽火岁月的历史见证，更是家国情怀的深刻诠释——他们舍小家为国家，以热血浇灌民族觉醒之花，用生命筑起抗战必胜的信念。80年过去，墨迹虽淡，精神永存。

男儿立志出山间 不灭倭寇誓不还

——滇军将士黄人钦家书中的壮志豪情

此次我们奉命出征抗日，是为民族求生存，为国家全领土，抱着最大的决心，无限的希望，抛去了家庭，离开了慈爱的父母、亲爱的兄长、新婚的你和挚爱的友人，誓和倭奴周旋到底。

我希望你开怀一点，在这全面抗战的当中，同我一样命运的人，何止我一个。还有亡了家、颠沛流离、穷苦无依、成千成万的难民，过着饮泣的生活。并且我有同一命运的兄弟们，在一堆痛饮欢呼高唱着抗日进行曲，准备杀敌致国。倭寇深入国土，民族危在旦夕，身为军人，义当报国。



黄人钦致妻书图片 云南省档案馆供图

“此次我们奉命出征抗日，是为民族求生存，为国家全领土，抱着最大的决心，无限的希望，抛去了家庭，离开了慈爱的父母、亲爱的兄长、新婚的你和挚爱的友人，誓和倭奴周旋到底”

“有男儿立志出山间、不灭倭寇誓不还”

“际此国家危亡之秋，正男儿舍身之日，勿以儿为念”

“是其当出师之日，即具杀敌致果之心”

……

这些家书，慷慨激昂，壮志凌云。它们出自全民族抗战时期。写家书的，是一名滇籍军人。当时，他正奔赴战场。

信是写给谁的？有给妻子的，有给朋友，有致友人的。写下这些信后，仅过了3个月，台儿庄战役打响，他争先生

卒，杀敌报国，最终壮烈阵亡。

这位军人名叫黄人钦，云南姚安人。阵亡前是国民革命军第六十军一八三师五四一旅一零八二团一营第二连连长。黄人钦为家中独子，中等学校毕业，因为志存救国之志，毅然投笔从戎，报考军官候补生队98师干部队，后历任排长、连长等职。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其父兄拟撮合黄人钦早日完婚，但他函告父兄：“倭寇此端侵占我国，正当我军人报国之日，国势如此，何以家为。”后经部队长官赞许，家长亲友再三劝勉，于1937年9月10日在昆明，与毕业于昆华女中的姑娘商幼兰举办了婚礼。

1937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感召和中共中央南方局、中共云南组织的积极工作下，以龙云为首的云南地方实力派积极投入到了全民

族抗战中，组编第六十军，于1937年10月5日农历重阳节，在昆明巫家坝誓师出征。当时，黄人钦与妻子商幼兰成婚仅6天，即赋骊歌，踏上征途。1938年4月，黄人钦随第六十军奉命从武汉奔赴台儿庄，参加第二阶段的徐州会战。在从昆明经武汉奔赴台儿庄的途中，黄人钦利用闲暇之余给亲人写家书，或致亲朋信函，字里行间慷慨悲歌，常存铁血救国的夙愿，表达舍身报效国家的决心。

1938年4月，黄人钦所在的第六十军一八三师，在以禹王山为中心的战斗中，配合徐州战区长官部的战役组织，坚持20多天的阵地战。滇军将士英勇奋战，前仆后继，英勇阻击，粉碎了日军在台儿庄直下徐州的企图，牵制着日军的精锐师团，为我数十万人大部队迅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赢得了宝贵的时间。4月

22日，黄人钦在此次战役中受重伤入院，最终为国捐躯，年仅29岁。台儿庄战役中，滇军壮烈牺牲的何止黄人钦一人。第六十军在坚守台儿庄的27天中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第六十军约4万人，其中参战人员35123人，伤亡18844人，营长、连长、排长伤亡过半，旅长、团长伤亡10人以上。

黄人钦牺牲的消息传到昆明，全家老幼悲伤不已。黄人钦的父亲悲痛欲绝，但仍说：“黄人钦以身殉国是军人的荣幸。”其妻子商幼兰更是深明大义，矢志不渝，以尽孝思。与他10余年肝胆相照的友人在悼念他时说：“人钦是中国新军人的典型。他以参加民族抗战为荣，乃至他笃于父子兄弟夫妇的情爱，而并没有改变其为国杀敌的大志。”黄人钦志在为国，他的友人在当时

的报刊发表纪念文章，称“人生终必一死，死与草木同朽，自不若死以救国之伟大及有价值。”时任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亲自为黄人钦题词“可歌可泣”，并号召广大的爱国青年，亦必须有此精神及志气，才足以纪念他，敬他而无愧于他。虽然黄人钦为国牺牲，但他和广大滇军将士用年轻的生命换来的和平，将会与中华民族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和抗战精神一样长存。

今天展读黄人钦的一封封家书，鲜活的身影和生动的抗战故事仿佛正从滚滚的历史烟云中向我们走来，我们耳畔仿佛又响起黄人钦们激昂的战歌：“云南是六十军的故乡，六十军是保卫中华的武装……”

殷俊燕
(作者单位：云南省档案馆)

感悟家国情怀的千钧之力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卷家书一念深。穿越历史的长河，三篇饱含个人深情与家国大义的家书，不仅是个人的情感倾诉，更是一个民族在存亡之际的精神呐喊，是家国情怀最为炽热且具体的呈现。

家书之中，见儿女情长，更见铁血丹心。黄人钦致信新婚妻子：“誓和倭奴周旋到底”；戴安澜将军诀别妻子：“为国战死，事极光荣”；白雪娇告别父母：“消耗于安逸与无谓中，才是更令人哀惜不置的”。他们何尝不眷恋亲人的关心、家庭的温暖？但在国家安危面前，他们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舍小我为大我”。这种选择，是将个人之爱融入对民族和对国家的大爱中。国若不存，何以家为？卫国，即是护家。

家书背后，是千千万万国人的精神觉醒与行动奔赴。这三封家书，勾勒出一幅全民抗战的悲壮图景：有黄人钦这样的地方军人，有戴安澜这样的军队将领，更有白雪娇这样的华侨青年。他们身份各异，却同赴前线；他们岗位不同，却信念如一。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抗战之所以能取得最终胜利的关键：中华民族凝聚起抵御外侮、救亡图存的共同意志，激发出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强大力量。

家书所承，是历久弥新的精神火炬；观照当下，更当以热血丹心铸就时代丰碑。这些家书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精神的火种。家书中的爱国之心、家国情怀，沉淀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基因。

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世代相传。我们要以史为鉴、以书信为镜，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平凡不平凡的贡献，向英雄致敬、向历史作答。这是我们对历史最深沉的回响，也是对未来最坚定的承诺。

龙敏飞



扫描二维码观看云新闻客户端《档案书信里的云南抗战》栏目

战场绝笔里的报国志

——国民革命军师长戴安澜家书里的精神传承

余此次奉命固守东瓜，因上面大计未定，其后方联络过远，敌人行动又快，现在孤军奋斗，决以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东、靖、篱、澄四儿，俱极聪慧，将来必有大成。你只苦得几年，即可有福，自有出头之日矣。望勿以我为念，我要部署杀敌，时间忙，望你自重，并爱护诸儿，侍奉老母！

2011年，由云南和江苏两地携手创作拍摄的电视连续剧《中国远征军》，再现了戴安澜将军及中国远征军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举，首映式上，令人印象最深的是剧中主人公戴安澜将军的儿子戴澄东带来的一封信：父亲牺牲前写给母亲的绝笔家书。

1942年3月，国民革命军第200师师长戴安澜率领中国远征军的先头部队开赴缅甸，支援盟友英军抗击日寇，在保卫同古、收复塘集等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意气风发的戴安澜将军欣然挥毫写下《七绝·远征》：万里旌旗耀眼开，王师出境岛夷摧。扬鞭遥指花如许，诸葛前身今又来。策马奔车走八荒，远征功业近秦皇。澄清宇宙安黎庶，先挽长弓射夕阳。

然而，由于英盟盟军连连丢城失地，造成中国远征军腹背受敌，被迫回撤。1942年5月18日，戴安澜将军在率部翻越野人山撤退回国途中与日军遭遇，在指挥突围战斗中不幸身负重伤，于5月26日在离中国国境仅有三四十里之遥的缅甸茅邦村殉国，时年38岁。

“壮志未酬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当戴安澜将军的灵柩到达昆明时，数十万百姓自发在街道两旁泣泪躬身，迎接英雄回家。国共两党领导人及社会各界纷纷以各种方式表达对将军的缅怀追思，国民政府为其举行国葬。毛泽东听闻戴安澜壮烈殉国的消息后亲笔题诗：“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窝威。浴血东

瓜守，驱寇棠归。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1956年，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追认其为革命烈士，毛泽东同志向戴安澜的遗属颁发了《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2009年9月，戴安澜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为还原一段真实的抗战历史，笔者联系了戴安澜将军的小儿子戴澄东。父亲牺牲时，戴老才两岁，对父亲的印象更多来自母亲数十年对父亲的缅怀与讲述，和那封父亲在缅甸写给母亲的最后家书。在现场，戴老深情诵读了这封数十年来已深深铭刻在心的绝笔信。

家书字字泣血、慷慨激昂，读者热泪纵横，闻者潸然泪下。字里行间，让人真切地感受到一位中国军人的铮铮铁骨、牵挂亲人的铁汉柔情和为国抱定必死的决心。写下这封家书时，戴安澜师长正率领第200师将士孤军奋战，危急关头，他向全师将士下达了这样的命令：“本师长立遗嘱在先，如果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参谋长代之；团长战死，营长代之……以此类推，各级皆然。”为国捐躯义无反顾，战至最后一人，流尽最后一滴血的牺牲精神与坚强决心至今振聋发聩。同时，作为丈夫、父亲，他在信中的殷殷叮嘱、惦念之情，也让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一位铁血军人在为国慷慨赴死的决绝背后，那一份依依不舍的眷恋与牵挂。

戴安澜总是把国家利益置于最

重要的地位。日寇在中国的恶劣行径，激起了戴安澜的杀敌报国之心，就连给四个孩子取名字，也都和抗战有关。给大儿子取名戴覆东，取覆灭东洋之意；二儿子取名戴靖东，小儿子取名戴澄东，表达男儿们勇敢出征，打败日寇之意；女儿则叫戴藩篱，表达修好篱笆，保卫家园之意。

戴安澜将军牺牲后，妻子王荷馨把国民政府颁发的20万元抚恤金全部捐出，以戴安澜之名在广西全州捐建了一所学校。将军的四个儿女没有辜负父亲的厚望，在母亲的教导下成长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才：大儿子戴覆东是我国享誉盛名的建筑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女儿戴藩篱是上海市政协委员，曾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二儿子戴靖东，系南京理工大学教授；小儿子戴澄东是水利高级工程师，曾担任江苏省水利厅副厅长、江苏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江苏省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等职。他们都成为各自领域的行业翘楚，圆了父亲知识救国强国的心愿。

时间过去了83年，当年的战火早已消散，但戴安澜将军在战场上留给亲人的这一封家书，却成为历史永恒的见证，每每品读，都能感悟到精忠报国的毅然决然。无论时光如何流逝，这份精神的火种将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代代传承，永不湮灭。

周权
(作者单位：云南广播电视台)

别亲赴国难

——南侨机工白雪娇家书中的爱国情怀

这次去，纯为效劳祖国而去的。虽然我是社会上一个最不值得注意的虫，虽然在救国的大事业中，我的力量简直是够不上“沧海一粟”，可是集天下的水滴而汇成大洋。我希望我能在救亡的汪洋中，竭尽我一滴之微力。

亲爱的双亲，此去虽然千山万水，危安莫卜，是不免凄怆辛酸。但是，以有用之躯，以有用之时间，消耗于安逸与无谓中，才是更令人哀惜不置的。因为生活就是斗争，尤其是在祖国危难的时候，正是青年人奋发效力的时机。这时候，能亲眼看见祖国决死斗争以及新中国孕育的困难，自己能为祖国做点事，就觉得此是不曾辜负父母亲的养育之恩。

在抗战的烽火岁月中，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毅然投身于保家卫国的伟大事业。当祖国急需支援的消息传到南洋时，无数华侨青年热血沸腾，奔赴祖国。其中，出生于马来亚檳城富商家族的白雪娇，以一封告别信诉说了自己的赤子之心。

白雪娇出生于1914年，祖籍福建安溪，自幼在优渥的家庭环境中成长。她的父亲经营着一家橡胶公司，是陈嘉庚公司檳城分公司的代理，家境十分殷实。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人文教育的熏陶，白雪娇心中对祖国的情感日益深厚，于1936年考入厦门大学中文系，接受更系统的中华文化熏陶。

抗日战争爆发，为躲避战乱，白雪娇回到马来亚，成为一名教师，但时刻牵挂着国家的危亡。1939年5月18日，在国家危难之际，她瞒着父母，化名“施夏圭”报名应征南侨机工回国支援抗战。临行前，她留下了一封感人至深的告别信，信中寄托了对中华民族认同的极致表达。

“我之所以不别而行，这是女儿勇气不够的缘故，因为骨肉之情，总是难免的。”信的开篇便展现了白雪娇内心的撕扯——不舍、矛盾、决绝……她既有传统孝道观念中对父母的愧疚，又有新时代青年对民族命运的担当。这种矛盾在“在每分钟内，我的心起著往复数次的矛盾冲突”的表达中达到顶点——一边是所恋的家和所爱的双亲姊妹，一边是破碎的祖国。她深爱着她的家，并将选择建立在牺牲这份小我的温馨之上，这使得她的选择更显悲壮和决绝。

家庭责任与祖国命运紧密相连。在传统家庭伦理框架中，“父母在不远游”是孝基本准则，但白雪娇认为“自己能为祖国做点事，就觉得此是不曾辜负父母亲的养育之恩。”她没有将爱国与尽孝对立，反而将为国效力视为更高层次的报恩，这一认知背后，是家庭环境的深刻影响。白雪娇的父亲是一位爱国华侨，叔叔白仰峰更是马来亚太平洋筹赈会副主席，在抗日战争期间积极参与南侨总会的筹

赈工作，捐巨款支持抗日，爱国基因早已融入家族血脉。她在信中特意叮嘱“姊妹的读书”需严加督促，既显长姐责任，更因为她深知家族的长远存续与国家的未来命运休戚相关。这封告别信超越了普通家书，成为连接家族小爱与民族大爱的精神纽带。

白雪娇是南洋华侨支援抗战洪流中的一滴水珠，折射出整个群体的光辉——海外华侨群体的集体觉醒和家国情怀。华侨虽身居海外，但始终与祖国血脉相连。白雪娇化名“施夏圭”，“夏”喻华夏故土，“圭”含归来之意，“夏”与“圭”，正是这种认同感的极致体现。当白雪娇“含着辛酸的眼泪踏上征途”时，她的背影里站着千万海外侨胞。

1939年，南侨总会号召华侨青年回国服务，组成“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滇缅公路的物资运输正急需人手，她的选择恰是这场奔赴无疆国救援行动的缩影。信中“消耗于安逸与无谓中才更令人哀惜”的宣言，道出了整个华侨群体的共同心声——在祖国危难之际，岂能享受安逸生活。这些华侨青年的无私奉献，源于一种超越个人利益的、深沉的文化认同和民族大义。白雪娇是“华侨乃革命之母”精神在抗战时期的延续和体现，她的故事是海外华侨群体爱国史诗中一个缩影。

从个人到家庭，再到华侨群体，我们得以窥见这封信所承载的惊人重量。白雪娇的人生轨迹恰是中华民族从救亡图存到复兴崛起的微观镜像。86年后的今天，重读这封家书，我们仍能感受到那种在私情与家国间抉择的艰难与崇高，而信中那句“后会有期”，也化作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以有用之躯效力祖国”的信念，如今依然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

夏玉清 刘思余
【作者1系云南师范大学华文学院教授、作者2系重庆青年职业技术学院教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南洋华商开发云南边疆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1939—1949）”的研究成果】